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东北流亡文学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研究卷

姚　韫
阎丽杰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　　编　张福贵
研究卷主编　韩春燕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东北流亡文学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研究卷

姚　韫　阎丽杰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　阳·

主　　编　张福贵
研究卷主编　韩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东北流亡文学 / 姚韫，阎丽杰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 11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13 - 5646 - 2

Ⅰ. ①地… Ⅱ. ①姚… ②阎… Ⅲ. ①地方文学 —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东北地区 Ⅳ. ①I20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0038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 chunfengwenyi. 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姚宏越　刘　维　　责任校对：曾　璐
封面设计：马寄萍　　幅面尺寸：155mm × 230mm
字　　数：179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1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313-5646-2
定　　价：4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24-23284384

序　言

不同的地域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文学。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这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沿革、民族风貌、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形成的人文环境因素。“东北流亡文学”是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时代印记的文学，它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东北文学青年创作的以东北人及其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东北流亡文学的创作主体即是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东北文学青年，他们亦被称为“东北流亡作家”。其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罗烽、马加、白朗、舒群、李辉英、穆木天、林珏、蔡天心、高兰、塞克等。有学者指出，它是相对于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殖民地文学”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既融汇在“左翼文学”“抗战文艺”“延安文艺”之中，又因内在的文学精神而相对独立成形。[①]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东北流亡作家给予高度评价：“东北流亡作家是一个有潜力、有才华的作家群，在三五年间，它经历了萌发、崛起、成熟的发展过程，艺术上也由初期的粗糙峻急，迅速转向雄健壮阔、深邃凝实。在现代文学史上，如此紧贴时代潮流而波澜迭起，风格独特而丰富多彩的作家群，是不多见的。”[②]

---

① 沈卫威：《关于“东北流亡文学”的思考》，《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66页。

②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525页。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本书在观照东北流亡文学创作的时代语境（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的前提下，更将其放在地域文化的场域中，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加以解读。纵观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始终彰显着特有的东北文化地域特质，黑土地厚重的自然原野和深广的历史文化构成其创作底蕴。东北的文化资源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动力，地域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他们的血肉，滋养着他们的创作。东北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作家的精神气质、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浸润，内化为“集体无意识”。这具体表现在东北流亡文学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构思、叙述风格、民俗世相的呈现、审美价值取向、语言表达等方面。

九一八事变及此后十四年的悲惨历史，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一个带有深刻历史投影的“东北文化现象”，出现了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的集体叙事，我们可将其形象地称为苦难的“东北叙事”。这一叙事不仅聚焦于九一八事变引动的东北创痛，同时也带有更为深沉的哲学思考，即根植、成长于黑土地的东北文化，在中华版图及中华民族数千年光阴中的地域定位、历史定位问题，如何理解这一动荡不休、灾变与生机并存的“苦难文化”，如何站在大中华的战略高度上正视复杂的“东北问题”，这对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抗战文化认知至关重要。

这些因战乱被迫流亡的东北作家，他们心中怒燃着国仇家恨之火，他们眼中映射着黑暗与光明轮转的岁月期待，他们渴盼借笔下生动的人物之口获寻一个继往开来的“东北解答”。简言之，抗战时期流亡关外的东北作家们所要表述与传递的，不仅仅是日寇铁蹄下东北民众苦难的哀鸣，更有着对东北文化的反思，对东北出路的诘问。这种思考触动光阴，触及灵魂，触发了一系列纠结话题的梳理与引申，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其内涵的巨大的现实意义，恐怕直到今天依然需要我们肃目以视、静心面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期的灾祸动乱，由古至今的多民族冲撞亦交融的跌宕历史，使东北文化灌注着一种筋脉偾张、热血奔流的独特质素，这一文化衍生的歌曲悲凉而慷慨，这一文化催生的文字火辣而张扬，它彰显着俗中见雅的壮丽豪迈，也透着笑傲江湖的苦难中的达观，所以，这一特殊时代、特殊地域中聚成的作家群体，有着个性鲜明的东北气质，这气质，饱浸着不容混同的地域属性与时代属性，因而别具魅力。

在东北流亡作家笔下，无论写人写景，还是说理抒情，无论是昂扬放歌，还是委婉低吟，文字的背后都奔跃着不可按捺的激情律动，仿佛在无边的黑夜中忽见一星希望的萤火的兴奋，仿佛在暴风骤雪中惊见茅舍炉火的冲动。那种流淌于字里行间触目皆是的不可抑制的心曲倾吐，令人望文即动情，掩卷而感动，这文字，天生便烙刻下醒目的东北标识，散发着回味无穷的东北味道。沉浸于这独一无二的东北叙事中，我们既能回首东北的曾经，也可眺望东北的未来；既能读懂东北人的家国情思，也能参破他们的内心渴盼。而由东北至中国，从“中国之一角”走来，重新俯瞰泱泱中华的辽阔版图，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目　录

第一章　亡国之痛与生死场的书写 ……001
第一节　抗战文学的先声：流亡者的歌哭 ……001
第二节　生死场的挣扎与抗争 ……010
第二章　逃离乡土与精神返乡 ……015
第一节　用文字为失去的土地招魂 ……018
第二节　个人记忆的别样书写与文化反思 ……026
第三章　生存环境与东北地域文化 ……040
第一节　游牧文化与渔猎文化 ……042
第二节　山林文化与绿林文化 ……047
第三节　日神文化与鸟图腾崇拜 ……060
第四章　东北流亡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067
第一节　抗日民众群像的塑造 ……068
第二节　“胡子”与“英雄”的双重角色定位 ……071
第三节　野性之美：东北流亡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078
第四节　无法言说的痛：流亡者形象概说 ……082
第五章　满族风俗与东北流亡文学创作 ……091
第一节　满族风俗与东北民俗生活场域 ……091
第二节　满族风俗与东北流亡文学 ……097
第三节　满族文学与东北流亡文学创作的内在一致性 ……100

第六章　民俗生活场域构建的东北流亡文学的情节冲突 ……104
第一节　民俗决定人物命运 ……105
第二节　不同民俗引发的冲突与误会 ……108
第三节　民俗导致爱情模式 ……113
第七章　民俗的融入与东北流亡作家的抗战策略 ……118
第一节　民俗文艺的二重性 ……120
第二节　民俗文艺的地域性 ……122
第三节　民俗文艺的集体性 ……124
第八章　文化与民族多元融合中的文学呈现 ……129
第一节　移民文化 ……129
第二节　外来文化 ……134
第九章　东北流亡文学语言的“东北风” ……147
第一节　东北流亡文学的语言表达方式 ……147
第二节　东北流亡文学的语汇特征 ……153
第三节　东北流亡文学的文本策略 ……165
第十章　东北流亡文学的美学特征 ……170
第一节　悲怆雄健与阳刚之美 ……171
第二节　疏阔勾勒的艺术笔法 ……176
第三节　散文式叙述笔法 ……179
第十一章　历史动荡中的滑稽 ……183
第一节　荒诞人生境遇中的悲喜剧 ……183
第二节　否定型滑稽与肯定型滑稽 ……186
第三节　对于丑的绝妙讽刺 ……188
第四节　逼仄生存境遇下的变形与异化 ……191
结　语 ……195
后　记 ……198

第一章　亡国之痛与生死场的书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白山黑水生灵涂炭，东北民众遭受异族的欺凌与蹂躏。有着切肤之痛的东北流亡作家以一种强烈的爱憎交织的群体意识和饱含血泪的文字，书写东北的灾难以及东北人的觉醒与抗争。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东北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李辉英）开始，到在关内引起强烈反响的《生死场》（萧红）和《八月的乡村》（萧军），再到《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边陲线上》（骆宾基）、《大地的海》（端木蕻良）、《伊瓦鲁河畔》（白朗）、《呼兰河边》（罗烽）、《登基前后》（马加）……可以说，日寇入侵的暴行和东北人的奋起反抗始终贯穿于东北流亡作家的“东北叙事”之中。

第一节　抗战文学的先声：流亡者的歌哭

东北流亡文学的创作是东北流亡作家在经历了丧失家园之痛后的一种文学的自觉。流亡在上海的青年作家李辉英于1932年3月至5月间，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东北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1933年3月出版）。作品以吉林“万宝山事件”为素材，描写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自卫队反抗日本军警的英勇壮举。虽然作者创作这部小说仅用了八十余天，属于急就章，但是它对于抗战文

学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它是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于日寇侵略者铁蹄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最初写照，是文学创作中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最初的呐喊，它当之无愧是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①]诚如作者所言：“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不旋踵间，又失去了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的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作为生养在东北大地上的一分子，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打击敌人的具体行动。执干戈以卫社稷，属于兵哲人的职责，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要。”[②]

在完成《万宝山》的创作后，李辉英曾潜回东北，先后到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对沦陷的故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返回上海后，他以这次回乡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救亡主题的小说和散文，先后出版了《两兄弟》《丰年》《人间集》三部短篇小说集。李辉英创作于1942年5月到1944年的长篇小说《松花江上》，写的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山村，居住的大多是从山东来的移民，他们开荒种地，打下了家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山村，横行霸道，逼得善良的农民们不得不组织起义勇军，采取联合行动，包围了县城，准备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一曲东北义勇军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英雄赞歌。李辉英回忆说，自己一直是“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来执笔写反日的作品的”。

同样流亡在上海的穆木天在推动诗歌大众化的过程中，痛感于家乡沦丧、生灵涂炭，创作了《别乡曲》和《守堤者》两组感伤与义愤交织的诗篇（收入《流亡者之歌》），控诉日寇对东北同胞的残杀，讴歌家乡人民的反抗斗争，抒发了流亡者的思乡之情。罗烽以纪念九

① 王吉有：《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② 李辉英：《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长春出版社，1988，第11页。

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了《伟大的纪念碑》《这是民族灭亡的警钟第一声》《五年祭》等诗作。1931年的9月18日是国耻日，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也是激励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救亡图存的日子。在《伟大的纪念碑》中，诗人把“九一八”称作“伟大的纪念碑”，并不是因为它记载着什么人或什么时代的杰出贡献和丰功伟绩，而是说它深深地刻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肢体上活活地撕去东北的弥天大辱。诗人要人们牢牢记住敌人的侵略罪行，念念不忘“九一八”，念念不忘沦亡。

我们记得：是谁喊着不抵抗，
我们记得：谁是抗战的英雄，
这一日突破历史的耻辱，
这一日也突破历史的光荣！

这振聋发聩的控诉和怒吼，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诗人在无情地揭露了日寇的血腥罪行的同时，又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暗示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才是“抗战的英雄”。诗人对时代的光明前景充满着坚定的信念：抗战——“这是侵略者的丧钟第一声！”

饱尝国破家亡之痛，深受颠沛流离之苦，罗烽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之时，向被日军铁蹄践踏下的故乡，献上《五年祭》一诗，倾诉衷情。但是，这里没有悲悲切切的哀叹和哭泣，只有一颗充满着“耻辱和仇恨”的心。罗烽发表过的唯一长诗《碑》，是自序传性质的三部曲：《奴隶的辱印》《祖国的海岸》和《明天，我回到故乡去》。《奴隶的辱印》，记录了东北大地上的悲哀与苦难，人民心灵里积压着的沉重的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愤怒。故乡的山川、田野、物产、一草一木，使诗人深深地迷恋。但是，诗人并没有把故乡的现实理想化，故乡有他所热爱的，也有他所仇恨的。在那里，军阀统治使东三省到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精神和肉体的绞刑”。九一八事变后，故乡浸在血泊中，人民的苦难之上堆积了更多的苦难。诗人死里逃生，离开家乡，带着遍身斑驳的“殖民地奴隶的辱印”，带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在诗的第二部分《祖国的海岸》中，诗人抒发了犹如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祖国的海岸，是“厄运的岸”，“灿烂的史迹”面临着一同陆沉海底的严重危机。他敲击着祖国的海岸，呼唤祖国觉醒。在长诗的第三部《明天，我回到故乡去》里，诗人为神圣的抗战而欢呼，而放歌。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誓将“耻辱平复”“仇恨扫尽”。诗人预言，明天，我们将会唱着欢快的凯歌，生出“鹰的翅膀”飞回故乡。[①]

如果说，李辉英的《万宝山》开抗战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那么1935年作为“奴隶丛书”出版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则为中国抗战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引起了轰动效应，令读者“齐声叹服”[②]。于是，当时分散在哈尔滨、北平、青岛的大批东北籍作家纷纷南下，群聚上海，构成了盛极一时的具有相关的群体意识、政治倾向、审美追求和心理机制的东北流亡作家群。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的乡村》出版时，国民党政府正推行不抵抗政策，不准言“抗日”二字，当时的报刊，连“东北沦陷”和“九一八事变”的字样也必须回避。下面是邢富君对萧军的专访《柳岸青青访萧军》中的一段：

> 萧军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蒋介石有明文规定，言抗日者杀无赦。我是对准刺刀尖去的，当时有些人不敢这样。你不敢，我敢了，这一点就比你高明。”
>
> 他的声调里蕴藏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青春热血仍在

① 高擎洲：《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罗烽诗歌创作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期，第133页。

② 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6年2月25日。

这位老人的血管里涌动着！我受了感染，禁不住称赞他当年的勇气。

萧军却轻轻笑了："什么勇气呀！有人管我叫亡命徒，说我是闯大运。老实讲，我那时只想，作品能让一个战斗者读到我就满足了。我有点实用主义，革命需要它，能达到目的就完，别的怎么样我不考虑，我写任何作品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对于中国抗战文学具有重大意义。马加的《登基前后》（1936年）真实地记述了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东北农村的黑暗现实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作者以纯正的东北语言和奔放的感情，展示了以陆有祥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们的正义反抗，格调沉郁，具有一种悲壮之美。浓郁的地方风俗人情与之相融合，更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蔡天心的《东北之谷》（1937年）是凝聚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和民族感的中篇佳作，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为纵深的历史空间，发掘东北民众烙印于心的民族之魂。作者精描细摹东北人民在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所呈现出的雄姿与风采，展现出以史诗般的语言而涂就的一幅幅壮美的图景，给人以心血的沸腾和战取光明的勇气。1936年骆宾基从哈尔滨流亡到上海，开始写作处女作《边陲线上》。作品描写了一支由苦工、学生、商人、胡子混合成的民族反抗队伍，展示了东北人民面对异族侵凌揭竿而起的原始状态。作品广泛地触及了边陲之地犬牙交错的民族矛盾。作者把人物的活动放在高山丛莽、虎啸狼嚎、雾罩鸦鸣的塞外荒凉环境中，更加有力地突出了这支抗日队伍生存的艰难。

逄增玉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关内文坛上虽然出现了周扬所描述的反帝文学高潮，但多数作品由于或者缺乏生活体验，或者过分"贴近"现实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流于茅盾当时指出的新闻记事的"小说化"。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改变了这一情形。他们直接地大规模

地表现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血与火的搏斗，将近代以来我国反帝爱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学的反帝主题，改变了现代小说中直接表现反侵略斗争作品较缺乏的局面，开拓了现代小说中的新的题材领域。[①]

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使东北沦陷，东北作家被迫流亡，而流亡的东北作家具有相同的经历，他们亲身体验了被侵略和被奴役的苦果，那种无家可归的伤痛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都从他们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且应该说，同样的感受给了他们同样的渴望，一面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一面是书写东北的苦难生活，礼赞东北人的觉醒与抗争。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以其饱含血泪的创作，控诉日寇的暴行，诉说东北人民的不幸，表现东北人民不屈的意志和斗争。这是直接的客观原因。

抗战爆发以后的政治现实向革命文艺提出了创作抗日反帝题材以唤醒民族意识的任务，这也是左翼文学的任务。抗战爆发以后，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最早向全国人民描绘了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的真实图景，表现了抗日救国主题，以及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强烈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情绪和创作内容，正好应和了左翼文学的要求。这是东北流亡作家形成的最有利条件。诚如学者王富仁所分析的："正是有了左翼文学的存在，东北流亡内地的知识分子才有了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伙伴，才有了发表自己文学作品的阵地。……左翼文学到底提供了给他们表达自己独立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的文化空间，到底没有拒绝他们偏激的情绪和粗粝的声音。东北作家首先找到的是鲁迅，虽然鲁迅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没有比自己更阔的朋友，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些比自己更不阔的朋友。是鲁迅，把东北作家一个个推上了文坛，并使这个作家群体逐渐壮大起来，成了左翼文学内部的一个独立的流派。可以说，

① 逄增玉：《新时期东北作家群研究述评》，载《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第297页。

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正是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第一次把在当时东北这块大地上、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形成的独立的生活体验、社会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到整个中国文化中来，成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①]

东北流亡作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离不开鲁迅的提携和关怀。鲁迅先生帮助出版了《跋涉》（萧军和萧红合著）、《八月的乡村》（萧军）和《生死场》（萧红）并为之作序。当萧军、萧红纠结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所选题材是否合乎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时，鲁迅立即写信答复“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②]，消除了二人创作上的顾虑。当《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有人质疑萧军“野气太重”时，他写信给先生请教这“野气”要不要改掉。鲁迅复信说：“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并对萧军所谓的“野气”大加赞赏。萧红初到上海困苦于创作不出作品的时候，曾写信半开玩笑地请求鲁迅用教鞭鞭策她，鲁迅却风趣地复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③]鲁迅在信中劝勉道：“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样情境……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的情形，以及各种人的脸。”[④] 萧军、萧红把鲁迅当作“光芒耀眼的灯塔”。1936年端木蕻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信，请教题材创作问

① 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②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17页。

③ 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第235—236页。

④ 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第235—236页。

题："怎样向东北草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深处去发掘呢，这个问题深深地苦恼着我。以怎样的原始的岸傲的雄健，他们的反抗与革命的斗力合流呢?"[①]鲁迅鼓励端木蕻良写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虽然与鲁迅擦肩而过，但写作中也先后收到重病中的鲁迅的两次回信。当然，鲁迅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帮助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物质上也是竭尽所能给予资助。萧军和萧红初到上海，举目无亲，连一张床也没有，是鲁迅从木刻家黄新波那里要了一张床，才使萧军萧红结束了打地铺的日子。没钱吃饭的时候，鲁迅就把自己的稿费送到他们手中；写出作品来，鲁迅就四处为他们寻找发表的地方。为了让他们很快熟悉上海的环境，广交上海文艺界的朋友，鲁迅还特地以祝贺胡风儿子满月为由，在梁园豫菜馆设宴特请胡风及夫人梅志、茅盾、叶紫、聂绀弩，把萧军和萧红介绍给他们，并当场要叶紫（与二萧的年龄相仿）做二萧的向导。流亡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在所难免，饥饿、寒冷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郁结在他们心中的创作情结以及写成的作品，就像星星之火，极易被泯灭。在危难中，鲁迅、茅盾、巴金、巴人等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鼎力相助，使东北不知名的小人物们一下子在全国闻名。[②] 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主要作家与冯雪峰、胡风、聂绀弩等左翼文化人士也交往颇多。聂绀弩为《萧红选集》写序，胡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写评论。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也是在茅盾、巴金、巴人等人帮助下，于1939年11月得以出版。[③]

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作品是带着生命热度和饱含激情的。沦为亡国奴的父老乡亲的呻吟、咆哮和逃亡后所见到的灯红酒绿之间的强烈反差，使东北作家感到双重的悲愤。在这种难以承受的遭遇下写出的作

① 端木蕻良：《致鲁迅》（1936年7月10日），载《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卷），北京出版社，2009，第3页。

② 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第235—236页。

③ 韩文敏：《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第17页。

品，在人物的选择、情感的触发、景物的描绘等方面，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浓郁的乡土寻根情结、平凡卑微的人生体验、孤独者的不懈追求。他们的逃离，正如罗烽在《呼兰河边》后记中所说，“不过是一只被灾荒迫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粗糙刺耳的嗓门”把“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的特定现实。端木蕻良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而作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就是这种苦闷至极的激愤声音的倾吐。他让一个六岁孩童幼嫩、娇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的沉重、悲苦、凄凉，写他对生活懵懂的恐惧。他将关内所谓纪念“九一八老娘们”的无关痛痒的形式与做作同东北人民艰难的生存与切肤的悲痛做鲜明对比。这是他的英雄梦不能实现的苦闷：欲报国死无战场。他的热情遭到禁锢，进而感到无奈、焦灼、愤怒乃至义愤填膺。《浑河的急流》（1937年）是端木蕻良最早表现民族意识、抗日情绪高涨的小说，描写了东北人民从屈辱忍耐到奋起抗争的历程。小说开篇一段浑河左岸白鹿林子一带秋景的描写，蕴含着祖国版图在变色、大好山河在沦陷、人民在惨遭欺辱。“金声”内心从小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深仇大恨，他平时练刀的游戏就隐含了“杀日本”的意思。在浑河两岸的猎户酝酿暴动之时，他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和联系者，并且抛却儿女私情，毅然走向战场。浑河之水映照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当浑河岸边的战斗打响，猎户们拉起队伍投奔义勇军时，送别爱人的水芹子“眼前仿佛看见浑河的水翻腾着流去”。她的战斗豪情因此激发出来，决心实践自己“用血把浑河的水澄清了”的誓言。在端木蕻良的小说《大地的海》中，农民在一望无垠的高粱地上发出的咆哮体现的正是东北人民的野性和力量，一种从东北的历史积淀和山河大野中喷发出奔腾的生命洪流。即使如《鹰鹭湖的忧郁》通篇弥漫着郁闷、绝望，但篇末却以“远远的鸡声愤怒地叫着，天就要破晓了”结尾，穿透满纸的郁闷，预示着光明的前景。端木蕻良的小说弥漫着“彻骨的忧郁”，交织着“繁华的热情”，并从忧郁中迸发出热情。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